

漂鳥

加拿大 華文女作家選
MIGRATING BIRDS
Contemporary Chinese-Canadian Women's Writings
林婷婷 劉慧琴 / 主編



中国致公出版社



漂鳥

加拿大 華文女作家選集

MIGRATING BIRDS

Contemporary Chinese-Canadian Women's Writings
林婷婷 刘慧琴 / 主編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鸟:加拿大华文女作家选集/林婷婷,刘慧琴主编.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145-0037-0

I. ①漂… II. ①林… ②刘… III. ①文学—作品
综合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2232 号

《漂鸟》由中国致公党党员史维学先生资助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权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发行

漂鸟:加拿大华文女作家选集

主 编:林婷婷 刘慧琴
策 划:范承玲 孙宇鹏
责任编辑:王 聪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11 号西门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12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印 数:1—3000 册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开

印 张:18

字 数:277 千字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5-0037-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万卷书籍，有益人生

——“新万有文库”汇编缘起

台湾商务印书馆从2006年1月起，增加“新万有文库”丛书，学哲总策划，期望经由出版万卷有益的书籍，来丰富阅读的人生。

“新万有文库”包罗万象，举凡文学、国学、经典、历史、地理、艺术、科技等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研究、译介，都是丛书搜罗的对象。作者群也开放给各界学有专长的人士来参与，让喜欢充实知识、愿意享受阅读乐趣的读者，有尽量发挥的空间。

家父王云五先生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曾经规划出版“万有文库”，列入“万有文库”出版的图书数以万计，至今仍有一些图书馆收藏运用。“新万有文库”也将秉承“万有文库”的精神，将各类好书编入“新万有文库”，让读者开卷有益，读来有收获。

“新万有文库”出版以来，已经获得作者、读者的支持，我们决定更加努力，让传统与现代并翼而翔，让读者、作者与商务印书馆共臻圆满成功。

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王云五

万卷书籍，有益人生



漂鳥

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

从历史发展条件看华文文坛 成为世界最大文坛之可能性

——写在《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卷前

根据统计，现今华人人口占世界第一位。中国内地 2007 年公布的数字是十四亿零六百多万，台湾是两千三百多万，世界各地华侨、华裔估计约五千万，所有这些人，都是说华语的。也就是说，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使用中文。说中国、中华民族是语言大国、语言大族，不是夸张之词。

中文又称汉语，从初民结绳记事起，少说也有六千年的历史。通常，一种文字年代久了，就会趋于老化甚至死亡，只有中文，可以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它就像一棵神木，老干加新枝，永远保持强壮的生命力。中文有精密完整的构成体系，经过悠久时间的演化始告完成，它弹性大，韧力强，可以大破大立，经得起任何新生事物与社会变迁的挑战。单就文学上来说，中国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赋和乐府的民歌，魏晋南北朝的诗和骈文，隋唐五代的诗和民间的歌赋，宋代的诗词，辽金元的杂剧和散曲，明清的诗和传奇，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学，一路发展下来，早已把中文锻冶成表述力、形象性最强的美文，而每一个时段，都对我们的民族语言产生了更新和提高的作用。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台湾，文学倾向西化，中文以中流砥柱之姿，与欧美各国的语言交锋，经过了一番碰撞，在“取”和“与”、“迎”和“拒”之间作了最正确的

选择，充分证明中文这世界语种的老前辈，一点也不古板、僵化，它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吸纳任何新的内容。当年“现代主义”新锐作家主张语言创新，实践经验证明，中文的延展性完全可以因此变化；任你拉长、压扁、扭断、打碎，但一经重组，就可以创造出新的可能，焕发出新的光辉。如此灵敏活泼的语言机能，最适合文学的表达，世界上大概只有法文才能跟它媲美。我们发展华文文学最重要的倚仗，非汉语莫属。

一般人的印象，认为中文难学，其实并非如此。中文有属于自己的逻辑系统，但并不古奥，它肌理明朗，亲切而家常，丝毫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初学者只要找到其中的诀窍，就可以循序渐进，登堂入室，领略个中三昧。也有人说，中文不重视文法，是一种粗糙的语言，其实这是错误的印象，中国是世界古典语言学三大发轫国之一，另外两个国家是古希腊和古印度。不过我们的语言学是另一类的、独特的，著名语言学家张至恭研究发现，汉语属非形态语言，形态变化上的限制极少，表面上似乎不特别强调文法，但却是一种“无法胜有法”之法，使人在自然的学习中领悟出表述的奥秘。

中文的另一特点，是历代累积的成语成句特别丰厚，形成所谓的“名言”，供后学者采撷，懂得活学活用的人，只要把古人名言重新铸造，就可以生发出新意。写作者尊重这个规范，熟悉这套名言的语汇，写文章就不愁技术上的出格犯规。

文化符码的概念，是中国古典诗词研究者们常常强调的。他们发现，诗词中的语汇每每超出文字表面意义而另有指涉，一个词汇就是一个符码。譬如说“终南捷径”，并非指在长安大雁塔上可以遥见的终南山下的那条小路，而是别有象征；唐代文人每每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举棋不定，究竟是隐居好还是出仕好，所有的矛盾挣扎，都在“终南”这个字眼上打转，这就是所谓文化符码。

中文与世界其他语言最大的不同点，是中文是带思想的文字，带感情的文字，学习它的人，不可能是不粘锅，任何人只要熟稔了它，进入它的世界，就不可能仅仅将之视作纯粹的工具来使用，一定会同时感染到文字背后的历史、哲学、伦理、文学意象等的象征，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涵泳在中国文化宏大的氛围中，令外邦人着迷、沉醉，有时使人怀疑学习者是不是忘了当初研习中文的目的，简直在进行“精神

移民”了。君不见很多汉学家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从语言贯穿到思想，从思想贯穿到生活，彻底“汉化”，如果再娶个中国太太，最后连穿着打扮、举手投足都是“老中”的样子了。在北京、台北已经有外国人以字正腔圆的京片子来说相声、数来宝，用流利的中文写文章。我们梦想中的“世界最大文坛——华文文坛”，将来要加上他们的身影了。

我不知道别的国家的文字有没有如此大的魅力，如此具有“侵略性”。当然，当年的上海十里洋场，也有人学了几句“番话”就变成假洋鬼子的，但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能以相看两不厌的心态面对西方文化，并且从外文的学习中，体会到中文在世界众多语言中占有怎样的独特位置，从而更珍爱自己的母语。在我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位大师级的作家，文坛前辈梁实秋和诗人卢飞白（笔名李经），他们“走向西方又回归东方”的心路历程，令我敬佩。梁先生是散文大家，学贯中西，他是翻译莎士比亚、撰写英国文学史、编纂英文大字典的人，但除了有绝对的必要，他从不讲英语，与他交往那么多年，没听他说过半句英语，忆起梁老，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袭穿旧了的长衫。李经与我相识于美国爱荷华大学，两人一见如故，彻夜论诗，不知东方之既白。他的英文造诣，好到可以到伦敦造访大诗人 T. S. 艾略特，他著名的那首诗《伦敦市上访艾略特》，写的就是与艾氏见面对谈的感受。李经的学问和诗创作虽然如此“高蹈”，但生活简朴，像个农夫，我向朋友介绍他，说他旅美几十年，任何时候就像昨天刚从杭州来的一样。从人格深处散发出来的芬芳，应该才是我们想象的“大文坛”的作家风范。

2009年9月，广东韶关举行“山海相约”诗歌活动，我因事不能与会，写了一段祝词，发在大会编的特刊上。我说：“华文文坛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坛，让我们为汉语诗歌描绘新的蓝图，缔造一个辉煌的文学盛世。我期望那集纳百川、融合万汇的大行动之出现！”我发飙的这段话，并非故作壮言慷慨，而是在非常激动的情形下有感而发。心中一直埋藏着这样的想望：使华文文坛成为世界的大文坛，不管这样的想法成不成熟，也不怕别人笑我浅陋，把它勇敢地说出来吧。经过两三年的沉思，我坚信这梦想有一天会变成理想，概念没有问题，以我们的人口（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学写作人口），以及汉字传播的普遍，加上我们在国际文坛上的热烈参与，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建立一个世界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的汉语大文坛。

语文是思想居住的屋宇，高屋建瓴，睥睨四邻总难免给人以张狂的联想，但为我们自己营造一间大屋子遮风避雨，绝对是必要的。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有杜工部同样的心情，同样的盼望！在这个超大号的精神大屋顶下，我们可以展开很多工作：编刊物，办出版，开大会，组织各种基金会照顾作家生活，更要创设一个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国际性的文学奖，奖励全世界的优秀作家，不让那位发明炸药的瑞典老头专美于前。得中国诺贝尔奖者或许是位外邦人，但总归也是“寒士”，也要让他尽“欢颜”！

或者有人担心，世界各地有那么多写作团体，挤在一个大屋子里，大家处得来吗？我认为这是不必担心的。世界上的族群数犹太人最团结。团结的原因，主要是靠犹太教会的整合。咱们的国家没有国教，如以文化的方式促进团结，绝对可以达到同样的功效。目前各地作家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但提到孔子孟子，李白杜甫，谁也不会有异议。一言以蔽之，文学（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

有人认为，世界上使用最多、传播最广的语文不只中文，英文（印度、澳洲、新西兰等）、西班牙文（中南美洲诸国）、法文（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同样是大语文的幅员范围，如果把那些语言相同的国家加在一起，它们岂不也可以跻身世界的“最大”？我想这些国家语言环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试将我们要组织世界最大文坛的条件加以归纳，可以举出下列四点：①人口众多；②语言优秀；③情分交感；④文化共融。这四大条件我们一样都不缺，而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却不具备。我们是王道，西方是霸道，根本上是两码子事。以别国语言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些是自己的国家族群太多，语言文字无法统一，不得已而借用外邦语言，以别人的喉咙发自己的声音。更多的国家是因为殖民的结果，殖民国以侵略的手段进行语言殖民，被殖民国心不甘情不愿地屈从了语言的现实。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人说英文，拉丁美洲各国的人说西班牙文，非洲一些国家说法文，只不过是把它当做纯工具使用而已，工具是没有色彩的，没有立场的，似乎人人可以得而用之。泰戈尔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也曾用英文表达，聂鲁达和博尔赫斯也向西班牙文借过火，但他们所彰显的却是自己民族的心魂。



华文文坛——世界最大文坛的建构，工程浩大，要把各种条件集中起来才可以毕其功。其实我们还有别的仗恃，追溯以往，我们发现，早期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欧陆的年代，华文文坛的奠基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如今把那些先驱者的文学活动连成一个整体来观察，就有深刻的意义了。

先说日本。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吸引了中国青年的目光，留学东瀛成为当年的潮流。鲁迅去得最早，1902年就东渡了。周作人1906年前往，一生迷上了日本。1906年李叔同（弘一法师）、欧阳予倩等人在东京创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新剧，开中国话剧运动之先河。1914年，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筹组的“创造社”成立于东京，该社成员回国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日本的华人作家形成文化气候。这种情形一直到抗战开始才停顿下来。

美国方面，胡适1910年赴美，创办《留学生季刊》，并试写新诗，出版《尝试集》，接着陈衡哲、闻一多、梁实秋，加上“五大臣出洋”（康白情、汪敬熙、罗家伦等），也形成了一种声势，而白话文学的提倡，使胡适成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领头雁。

欧陆各国，1919年间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赴欧，李金发、林风眠、王光祈在先，徐志摩、袁昌英、梁宗岱、朱光潜稍后，以巴黎为活动场域，这些人中有作家也有画家、雕刻家，中国美术家留欧的传统由此开始。

东南亚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东南亚各国的新华（新加坡）、马华（马来西亚）、菲华（菲律宾）、印华（印尼）、泰华（泰国）、越华（越南）文坛如雨后春笋相继诞生，由于此一地区距祖国较近，与内地文艺界渊源深厚，生活在本土的作家也有很多远赴南洋，或创办报纸，或主办刊物，如郁达夫、胡愈之在新加坡，巴人（王任叔）在印尼，都留下了可观的文学业绩，影响深远。这种互通声气的双向交流，使海外文坛与本土文坛形神相通，创造了同其血缘却各具风格的文学风貌，而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情调与异国风味，也丰富了中国原乡文学的内涵。这几年由于大马青年作家群在台湾旋风式的出现，使两地文坛的互动更为频繁，有些马华作家同时参与两个文坛的文学建设，成为“世界华人文学一盘棋”的最佳样板。

近三十年来的美加华文文坛相当蓬勃。50~60年代，台湾掀起留学热，“留学生文学”应运而生，主要的活动场域在美国的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这三个华人最多的城市，普遍设有文学社团，也有文艺刊物的创办，蔚然形成洋溢青春气息的文风。报纸副刊方面，作家的发表园地多集中在《世界日报》、《明报》和《星岛日报》。《世界日报》社长马克任，办报之外也主导美国华文文学活动，建树甚多。加拿大华文写作活动较美国为迟，近二十年成立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温哥华）、加拿大华人作家协会（多伦多）、加拿大中国笔会（加东地区）以及诗人洛夫组织的“漂木艺术家协会”活动很积极。他们在深化华文文学主题思想方面新猷甚多，近年更特别重视与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团的横向联系，邀请聂华苓、刘再复、叶嘉莹、洛夫、痖弦、王健担任这些社团的顾问，把文艺活动提升到文艺运动的层次，影响自是不同。

以上的简述，旨在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显然，事实的存在先于理论的提出，建立世界最大文坛的倡议，虽属隐形宣言，但先驱者们的开拓之功不可或忘。

老子认为，任何人与事，若是分裂就会崩解，存在着重整合。老子曰：“昔之德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西哲也有共相殊相，大我小我，大宇宙小宇宙的概念。共相是一般，殊相是个别；大宇宙（大我）是世界，小宇宙（小我）是个人；大我小我得到统一，变成一个大意志，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大民族，一个大民族如中华民族者应有的作为。建构大文坛，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世界。它代表华文文学迈入了成熟，有了文化担当，如此才可以激动潮流，引领时代。

老子所说的“一”与西方哲学家说的“大意志”同理，但并非一般所说的定于一尊，对文学来说，定于一尊是危险的。文学贵在联合，联合不是无意见的凝结，而是众声喧哗；不是文学思想或创作路线一致化，更不是强调群性，压抑个性。联合的精神是：不同文学观念的彼此尊重，不同文学作品的兼容并包，不同文学理想的异中求同，不同文学道路的并行不悖；在和谐的气氛下，以相敬相重来替代孤芳自赏、唯我独尊，以共存共荣替代各立门派，党同伐异，这方是大意志大文坛应有的宏伟气象。那么多不同的作品蜂拥汇集，一定会乱，我的看法是，真正的文



漂鸟

加拿大华文女作家选集

学大家族不怕“五胡乱华”。乱，常常是繁荣昌盛的另一表象，是新事物、新生命孕育的必然过程，所谓乱中有序，那个序，历史老人自然会为吾人爬梳整理出来，一部文学史就是这么写成的。

谨以此文向以《漂鸟》一书为世界最大文坛华文文坛巨厦添砖加瓦的女作家们致敬。

痼弦

2009年11月1日写于温哥华



我们都是漂鸟吗？

——《漂鸟：加拿大华文女作家选集》代序

今年年初，林婷婷到台北来，在台北来来饭店向曾茂川先生与我谈到，她想要编一本加拿大华文女作家的选集。当时我也很赞成，并希望她赶快进行。结果，她很快就找到旅居加拿大的华文女作家刘慧琴女士，共同主编这本旅居加拿大华文女作家的作品选集《漂鸟》。

林婷婷是我二十多年前认识的文艺界朋友。二十多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各自漂泊不定，但是，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对于菲律宾，我们有共同的感受与体验。我们所认识的菲律宾华人，或已移民他乡，或仍坚守在蕉风椰雨的南国，都让我们倍感亲切与怀念。

我也曾去温哥华与落基山脉一带旅行，对于加拿大，我也有一份特殊的感觉。我们绕着地球来来去去，我们也是漂鸟吗？我们心灵如果没有安定感，是否也像漂鸟一样，总是想要移栖驿动？华人移民在海外，是否心系家乡？她们借着文字散发出来的心声，是否像漂鸟的呢喃？

无论如何，当我阅读过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后，心中感到充实。她们来自各方，因缘际会相遇在加拿大，又借此出书的机缘，留下了她们心中的感动。或许他日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有人会读到这些心灵的撼动，感受到漂鸟的心情。

我们都是漂鸟吗？





漂鸟也有今天与明天，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人在何方，又有何妨？
漂鸟的心情，透过文学与出版，好比把心声装在玻璃瓶，让它传到天涯海角。让我们打开来看看吧，或许我们也会有一些感动吧。

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方鹏程谨序

2009年9月24日

漂鸟

加拿大华文女作家选集

前言

◎徐学清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加拿大华文文学首部女作家作品选集，全书选入当代加拿大华人女性作者、学者的小说、散文、随笔、诗评共五十余篇。本书作者遍布枫叶国东西诸省，及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居住的加拿大华裔，其中有好几位是英汉双语作家、学者，她们都有多年丰富的写作历史，更有众多作者荣获加、中国国家级等各种文学大奖。

加拿大的华文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多，作品也比她们的异性多，艺术成就也不让须眉。虽然由于版权的原因，已经收入各种文集的女作家的代表作不能被编入，这部选集仍然从广角度真实地展现了她们十多年来的创作实绩。除了个别散文游记之外，作品大都以女性为主角，描绘她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和独立女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环境中的喜怒哀乐和生活感受。她们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身份的定位在这部集子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加拿大华人浓烈的女性话语，渲染着多元文化多色多歧和作者个性多姿多态的斑斓。

作为女作家作品集，很自然地，这部集子在很大篇幅上表达了女作家对女性问题，女性的独立意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的见识，尤其是那些对在枫叶国里的婚姻、爱情、家庭生活的描写的篇章，形象地反映了这些女作家的深沉思考。葛逸凡的小说《丑女奔月》是一篇对纯情女性的礼赞，虽然主角“我”在婚姻上被丈夫利用后被迫离婚，但是主角的善良、宽厚和母爱最终让她得到了真正爱情。与此好人有好报的母题相反，曾晓文的小说《气味》是对女性反抗的欣赏。珉珉的婚姻插入了第三者，对于丈



夫的背叛和欺騙，率真的珉珉並沒有像《丑女奔月》中的女主角那麼寬容，逆來順受，相反的，她運用智慧使前夫及其新妻用欺騙的手段占去的房子奇臭無比，臭味似咒語般始終伴隨著他們。涯方的《瓶》的敘述角度很特別，小說從一個細瓷花瓶的視角來觀察一個移民家庭的裂變，刻畫主婦從依附轉為自立的雖然痛苦然而最後解脫的過程。

女性一旦具有了獨立意識，就能坦然地面對丈夫有了外遇的現實。寄北的散文《丈夫有了外遇以後》顯示了女性與生俱來的寬容和超越男性的更高境界，從多方面討論了如何處理“有了外遇”以後出現的各種狀況，與上述小說所表現的女性觀不謀而合。

原志的《與女權活躍分子們相處的日子》生動描述了她所接觸的加拿大女權主義者的形象，她們激進的平等權益的觀點，她們為爭取女性權利的不懈努力的成果，已經成為當代加拿大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華裔女性，使她們在與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傳統的抗爭中找到了自己，同時也從男人的附庸中解放了自己。

不甘心附屬於男人的女性往往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和能力，從而在事業上有所成就。那麼成功的女性是否就能保證婚姻愛情的穩定呢？安琪的小說《回家》、秋萌的《遲來的醒悟》、沈可全的《婚惑》均描寫成功的女性與她們相對來說不那么成功的丈夫之間的關係，在向“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挑戰的同時，它們揭示了女性在成功以後的兩難境地。面對着女人應該依傍着男人寬厚肩膀的習俗，女性似乎別無選擇，要么重新依附男人，要么失去自己的丈夫（《婚惑》）。然而，女性自己是否也拘束於男人必須比女人強的這一觀念呢？自己比丈夫更有成就，應該為自己的價值得到承認而感到自豪，還是煩惱？《遲來的醒悟》傳達的是女主角的未免有些晚到的懺悔，小說的反諷性在於女主角為了要求丈夫同樣功成名就，卻最終逼走了丈夫。小說《回家》為讀者提供了比較理想的結局，在家庭、感情與世俗觀念的天平上，女主角更珍惜的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感情，它不應該成為傳統觀念，外界說三道四的犧牲品。既然女性能成為家庭的頂梁柱，男性又為何不能做家庭“煮夫”？《回家》的意義在於打破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文化秩序，女性真正的獨立不僅建立在失去所依附的丈夫後能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還在於能成為被依附的主體。黃綿

的散文《枫叶又红了》也传达了这一主题。而陈苏云的小说《原色》则塑造了一位在精神上让男人“依附”的女性形象，她的超脱，她的独立见解，使男士们不由自主地要找她来指点迷津，解脱烦恼。

张翎的《母亲》和朱小燕的《哭泣的小蜜丽》在题材上扩展了这本集子的广度。母亲和祖母带着浓厚的文化习俗来到加拿大与儿子的一家一起生活，文化冲突竟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两部作品以淡淡的伤感描绘了母亲、祖母所具有的传统女性的种种美德，充满着爱、自我牺牲、任劳任怨、奉献和宽容，以及她们在文化错位中所感到的忧伤。

有着丰厚的中华文化背景的女作家们，沉浸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中若干年后，除了女性意识的强化，还在异乡的民俗风情中，培育起文化交叉的视野，选入在这本选集中有很多散文，是作者们在枫叶国与其他族裔之间的友情的生动记叙和对加国人文景观浓墨重彩的描绘。孙白梅的《情同手足》、张金川的《裘娣的周末》、赵廉的《水土》、郑羽书的《孩子，你又惹祸了（外一篇）》、陈华英的《美好的故事》，以女性的细腻和善解人意为读者勾勒了多幅加拿大人的人物素描画像；而西岸海豚的《当温州人遭遇犹太人》则展示了在加拿大房地产商场上有“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跟犹太人之间锱铢必较的耐力和智力的格斗；为力的《北方之旅——访印第安居住地》和刘蕊的《悠悠白石镇》，牧歌似地悠扬着迤迤壮阔的北部自然景色里的加拿大原住民习俗人情和西海岸海天一色中的小镇风光。王洁心的《诗意》在加拿大的自然景观中，体验到中国古代诗人所描绘的人与自然和谐、物我两忘的幽远意境。阿木的《一个士兵之死》通过叙述一位服役在阿富汗士兵的恋爱故事，赞颂加拿大战士为保护和平而作出的牺牲。故事虽无硝烟，却感人至深地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给心灵带来的永久的创伤。

作为漂泊者的女作家们，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温安娜的《撒丝基亚，撒丝基亚》、王平的《阆苑祖屋》和申慧辉的《风筝》，从不同阶段真实反映了加籍华裔在融入加拿大文化社会过程中的艰涩步骤：她们如何在祖裔文化和居住国多元文化之间徜徉后，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开放的、多向的、多元的文化身份观。

收入在集子里的还有若干篇游记，记录作家在各国旅游采风的踪迹，如海伦的《神秘骇人的埃及之旅》、诺拉的《Aloha! 夏威夷》、刘慧心的



《驾车自由行》、曹小莉的《意大利的吉卜赛扒手》、雪梨的《牛舌镇之秋》等。这些作品以流畅的文笔，风趣的笔触给读者介绍着作者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和奇遇惊历，为集子增添了异国情调和风韵。

散文篇章中结构上颇具特色的是江岚的《味道的珠链》、林婷婷的《保姆》、庆庆的《告别即是相会》和汪文勤的《土豆唱歌》，均围绕着各自的主题由点及面，层层深入，或者攫取最为动人的细节作多方面的铺陈（《味道的珠链》、《土豆唱歌》），或者历数古典诗句以鉴别离情别意的不同境界（《告别即是相会》），或者递进式地逐层阐发描写主体的本义和延伸义，最后把主体内涵扩展提升到文化的最高层次（《保姆》），立意新颖别致。

这部文集中最突出的是叶嘉莹的《说李清照词二阙》，因为它是唯一的一篇学术文章，也因为它的鞭辟入里和洞幽烛微。文章一再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力，深入浅出的文本分析让读者深切体会中国女词杰李清照两首词《南歌子》和《渔家傲》抒情的含蓄精妙和意境的辽阔高远。

法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克利斯特娃认为，女性语言是符示的（semiotic）、非象征性的（symbolic）、有韵律的（rhythmic），它与所描绘的对象之间并没有被限制的关系，相反，有着丰富的启发读者想象的互动关系。纵览全书，虽然作品的题材丰富多样，但是女性话语的特征非常鲜明，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抑或是词论，作品的语言富于生动的意象、形象和诗意，它们能绵延出许多遐想，不同的读者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产生出相对应的审美感受和联想。《漂鸟》的题目也如此，它给予人的想象空间，海阔天高，任凭扶摇翱翔。飞出国门的女性作者，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回顾审视，前瞻比较，经历了与传统习俗决断的阵痛，获得了对女性本身生命意义的感悟和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也许，李清照的词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恰可以用来表现她们的跨文化、跨国界追求生命终极意义的英姿。最后，我想借用叶嘉莹教授对李清照《渔家傲》分析中的精辟论断来结尾：她们“实在已突破了现实中一切性别文化的局限”，她们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是对普世的人生究诘的反思，作出了一种飞扬的超越。”正如南来北往的鹏鸟，她们所拥有的是整个青天。

徐学清

2009年6月写于多伦多